

东亚通交中的译语人考述^{*}

陈建红 苗 威

【内容提要】译语人是东亚通交中不可或缺的中介群体。由于汉文化圈中官修史书的局限，译语人史事零星散布于史籍之中，其称谓繁杂，职责多元。他们来自不同部族，职司翻译、使者、向导等诸多角色。中原王朝对自身和周边诸政权所需要译语人的教育与培养贯穿于历史发展的整个过程，且不断完善。这一群体活跃于东亚通交的每一个环节，贯穿于东亚历史发展之始终，不仅搭建了东亚区域交流的桥梁，同时促进了东亚区域的理解与融合，是古代东亚区域一体的重要元素。

【关键词】译语人 四夷 东亚

【作者简介】陈建红，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生；苗威，山东大学东北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在东亚的政治生态中，和谐和平的交往与交流远比暴力残酷的武力征伐与威慑更为常态。中原王朝在天下秩序的构建中，时常通过派遣使臣进行“招抚”的方式达到靖边抚远的目的。周边部族为保障自身安全，获得必要的政治经济利益和文化滋养，也会积极地派遣使者前往中原王朝朝觐纳贡。这种交往的过程在史书中往往以“遣使册封”或某国“来贡”等简要记录一语带过，给人一种双方交往频繁、沟通无碍的错觉。事实上，古代交通相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专项“中国与朝鲜——韩国古史体系研究”（项目号：17VGB005）的阶段性成果。

对封闭,持共同语言的区域远没有现代广阔。在东亚地区,周边部族和四夷番邦日常使用的多是土著语言,彼此之间并不能实现毫无障碍的沟通。无论是东亚地区间的官方使节完成出使任务,还是民间各种商贸、文化等非官方领域的交流与合作,都需要译语人的协助与沟通。目前,学界关于译语人的研究多集中在语言学领域,^①按年代划分,以明清时期为多。^②在历史研究领域,一部分学者利用一手资料对译语人的个案、族群、在特定历史时期的作用进行了探讨;^③还有一部分学者对特定地区内的译语人进行了研究;^④更多学者则是在东亚交流史的研究中简要论及译语人的相关问题。^⑤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东亚译语人的教育、职司以及异称等相关问题进行探讨,勾勒出译语人教育成长、日常履职的基本轮廓,为学界了解东亚的古代通交实况提供一个思考的角度。

一 译语称谓的缘起与演变

所谓译语人,主要是指在跨语言地区通交过程中担任翻译及相关职司的人。这一群体既有官吏也有平民。与之相关的记载最早见于《礼记·王制》

-
- ① 这类研究成果较多,如刘迎胜《宋元至清初我国外国语教学史研究》,《江海学刊》1998年第3期;马祖毅《中国翻译简史——“五四”以前部分》,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4;等等。
- ② 乌云高娃《明四夷馆“女真馆”和朝鲜司译院“女真语学”》,《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1期,第127~133页;任萍《记我国最早的翻译学校——明四夷馆考察》,《上海翻译》2007年第2期,第53~56页。胡振华《珍贵的回族文献〈回回馆译语〉》,《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2期,第87~91页;任萍《明四夷馆中日本馆译语编撰考》,《日本学论坛》2007年第2期,第73~76页;刘红军、孙伯君《存世“华夷译语”及其研究》,《民族研究》2008年第2期,第47~55页。
- ③ 李锦绣《唐代的翻书译语直官:从史河耽墓志谈起》,《晋阳学刊》2016年第5期,第35~57页。李宗勋、陈建红《试论新罗译语的来源及其特点》,《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第69~73页。赵贞《唐代对外交往中的译官》,《南都学坛》2005年第6期,第29~33页;李忠辉《汉至清代朝鲜语译员的设置及活动研究》,《东疆学刊》2017年第2期,第8~13页。
- ④ 李方《唐西州的译语人》,《文物》1994年第2期,第45~51页;韩香《唐代长安译语人》,《史学月刊》2003年第1期,第28~31页;朱丽娜《唐代丝绸之路上的译语人》,《民族史研究》2015年第12辑,第212~228页。
- ⑤ 谢海平《唐代留华外国人在活考述》,台湾商务印书馆,1977;李宗勋、陈建红《圆仁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与九世纪东亚海上通交》,《东疆学刊》2008年第2期,第53~61页。

篇》：“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王文锦认为，“寄”、“象”、“狄鞮”和“译”是四夷方言对译语人的不同称呼，“东方称之为寄，南方称之为象，西方称之为狄鞮，北方称之为译”。^①宋高僧赞宁则认为“象”、“寄”、“狄鞮”和“译”为氏族部落所承袭的官职，“是故《周礼》有象胥氏通六蛮语，狄主七戎，寄司九夷，译知八狄”。^②今本《周礼》将“掌蛮夷、闽貉、戎狄之国使，掌传王之言而谕说焉”的译语机构称为“象胥”，其具体职能及人员配置均有详细规定。关于“东方曰寄”，《礼记·王制篇》有另外一处记载，其曰“小胥、大胥、小乐正简不帅教者……屏之远方，西方曰棘，东方曰寄，终身不齿。”^③可见，“寄”当是有具体所指的东方某地，而“棘”与“狄鞮”切韵相同，似乎可以理解为转音，是指西方某地。由此，赞宁所言殊为可信。掌四方夷狄翻译接待之官各有其称，周为世官制，特定部族承袭特定官职亦是常态，因此，“寄”、“象”、“狄鞮”和“译”的最初之意可能是掌四方翻译的四个归附部落，其后逐渐演绎成四夷方言对译语人的称谓。

关于古书所言译语人的四种称谓后来为何仅存“译”字，赞宁认为主要有两种可能：一是自汉以来北方多事，翻译人员使用频繁，是以“译语官”成为沟通异域官员的代称；二则可能是周秦使者已经掌握东、西、南三个方位的地方语言，无须翻译即可与之沟通，由是“寄”“象”“狄鞮”不复使用。^④这种认识颇有见地。自秦汉之匈奴以至后世，中原政权的北部边疆鲜有安宁，译语人的使用自是频繁；秦汉疆域东、南皆至海，西南、西北疆域多有拓展，先秦之异域伴随疆域的拓展已成国土，“寄”“象”“狄鞮”所司之语已为方言。由此，“译”则由专指通传北方各地语言的部落转变为一般性指代称谓。

① 王文锦《礼记译解》上册，中华书局，2001，第176~177页。

② (宋)赞宁《宋高僧传》，中华书局，1987，第52页。

③ 王文锦《礼记译解》上册，第176~177页。

④ 赞宁指出“今四方之官，唯译语官显著者何也？疑汉以来多事北方，故译名烂熟矣。又如周秦辎轩使者，奏籍通别国方言，令君王不出户庭坐知绝遐异俗之语也。若然者，象胥知其远也，方言知其近也。大约不过察异俗、达远情者矣。”参见(宋)赞宁《宋高僧传》，第52页。

二 译语官的教育

身份认同是人类社会属性的重要表现之一，通常包含族群血缘认同、地域认同以及文化认同三层含义。在中华文化圈的夷夏之辨中，文化认同往往高于族群血缘认同和地域认同，是身份认同的最核心的部分。换言之，来自异域的个体人或族群在完全接受中原文化和社会行为准则之后，也会被中原族群所接受，其原有的血缘和地域差异不再成为绝对桎梏，这也是中华民族不断凝聚壮大的原因所在。针对中原政权所接受的译语人的培养并非单纯的语言技能培训，关键在于使其实现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从这一意义上来看，东亚译语人的养成过程，实质上就是文化认同和身份重构的过程。

这一过程，以在衙署中工作的译语官表现得最为典型，即个体的“藩客”、“夷人”或“胡人”通过教育、培训或是侨居、婚姻等其他途径，掌握汉字、汉语，接受中华文化，实现文化认同，进而在中原政权任职，实现由蕃胡蛮夷到朝廷官吏的身份转换。这种官吏在各级官署机构中占员并不多，因而其所承担的往往是与翻译有关的各种事务，如接待使者、勘验文书、充当向导甚至刺探情报等，这就要求译语官不仅要熟悉语言翻译，还必须掌握各类文书的行文格式，熟悉官方礼仪和办事程序，甚至知晓各地民俗风情、山川地理等。在多重要求下，译语官的养成必须经过一套复杂的教育系统和一个层层筛选的选拔机制。当然，这一养成过程对译语官自身而言无疑也是一个艰难而又漫长的过程。

关于译语官的官方教育与管理的具体规定，最早见于《周礼·秋官·大行人》：“七岁属象胥，谕言语，协辞命。”郑玄注云“七岁省而召其象胥，……皆聚于天子之宫，教习之也。”孙诒让释曰“此谓行人召侯国之象胥、瞽史来至王国，则于王宫内为次舍，聚而教习言语、辞命、书名、声音之等也。”^①由此可以看出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译语官一般来源于番邦或者是侯国，为异域之人。事实上，就目前的史料来看，后世汉唐的译语官，无论吏属中央还是地方，以异域归化者居多。比如西汉张骞出使西域，随行译语甘夫为匈奴人；唐代中书省的译语官

^①（清）孙诒让《周礼正义》，中华书局，1987，第2982~2984页。

史诃耽乃昭武九姓的史国人;^①唐代在长安^②、西北边疆^③和东南沿海^④活跃的译语官也多来自异域。

二是官方会统一组织译语官的培养。译语官培养是双向的,既包含对本国外交机构所需翻译人才的培养,也包含对番邦四夷所需要的外交人才的培养,这就给译语官的教育培训提出了更为复杂的要求。“聚而教习”,在时间上有定制,即“七岁属象胥”;在内容上不仅仅是单纯的教授语言,而是有一套系统的教育内容,即所谓“言语、辞命、书名、声音之等也”。尽管《周礼》对于译语官教育内容的记载语焉不详,但《国语·楚语·申叔时论傅太子之道》可以做补充“庄王使士亶傅太子箴,对曰:‘……蛮夷戎狄,其不宾也久矣,中国所不能用也。’王卒使傅之。问于申叔时,叔时曰:‘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休惧其动;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礼》,使知上下之则;教之《乐》,以疏其秽而镇其浮;教之《令》,使访物官;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而戒惧焉;教之《训典》,使知族类,行比义焉……’”^⑤“楚为蛮夷”是两周时期中原诸侯一致的看法,^⑥楚人自己亦如是说。^⑦因此,申叔时对于楚太子箴教育内容的建言,可以从侧面反映蛮夷教育的内容。由此可以推知,译官教育的内容可能包括中原正统历史、帝王世系、官方礼仪、雅乐、官方规范用语、典章制度、法度律令等诸多方面。这是基于中原正统文化认同的系统的教育过程。

三是译官教育有着严格的考核制度。译官作为中原官吏,行为、言语皆代表的是中原政权的王命,同时还负有向“化外蛮夷”宣教中原礼仪文明的职责。因此,深刻理解中原文化、礼仪的内涵,准确把握中原政权的政治

① 李锦绣 《唐代的翻书译语直官:从史诃耽墓志谈起》,第35页。

② 韩香 《唐代长安译语人》,第29页。

③ 李方 《唐西州的译语人》,第45页。

④ 李宗勋、陈建红 《试论新罗译语的来源及其特点》,第69页。

⑤ 《国语·楚语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第349页。

⑥ 何明新 《楚为“蛮夷考”》,《重庆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3期,第25~30页。

⑦ 《史记·楚世家》有两处楚王自称蛮夷的记载,其一,“熊渠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其二,“三十五年楚伐随。随曰‘我无罪。’,楚曰‘我蛮夷也……’”。

利益, 是其所必须具备的核心职业素养。因此, 为保证译官忠诚履职, 周代对于译语官教育的考核十分严格, 据《礼记·王制篇》记载 “小胥、大胥、小乐正简不帅教者……屏之远方, 西方曰棘, 东方曰寄, 终身不齿。”由此可见, 译语学员若不努力学习, 未达到考核标准, 处罚相当严厉: 直接流放边地, 且终身不得录用为官。

自秦至宋, 译官在何处培养鲜有专史记载, 但各代均设有诸如典客属、鸿胪寺、四夷馆等专门的外事机构,^① 一般情况下, 这些机构除承担翻译、接待任务之外, 也会承接一定的译语官的培养任务; 各代官学之中多有招收留学生的记载, 如 “复为功臣子孙、四姓末属别立校舍, 搜选高能以受其业, 自期门羽林之士, 悉令通《孝经》章句, 匈奴亦遣子入学”。^② 唐代, 新罗、日本等国皆曾经派遣留学生、学问僧入华, 部分表现优异者可授予官职, 令其出使本国, 或充任本国使臣再度来华, 如北宋太平兴国元年(976) “(王) 侁遣国人金行成就学于国子监……其年(太平兴国二年, 977) 行成擢进士第……雍熙三年(986) 十月, 遣使朝贡, 又遣本国学生崔罕、王彬诣国子监肄业”。^③ 这些留学生中的表现优异者应该也是译语官的重要来源。

元明清时中央官学译语官教育再度见诸史料。元代为了保持与西域三大汗国的联系, 设置回回国子学以教授亦思替非文字(阿拉伯语), 据《元选举志》载:

世祖至元二十六年夏五月, 尚书省臣言 “亦思替非文字宜施于用, 今翰林院益福的哈鲁丁能通其字学, 乞授以学士之职, 凡公卿大夫与夫富民之子, 皆依汉人入学之制, 日肄习之。”帝可其奏。是岁八月, 始置回回国子学。至仁宗延祐元年四月, 复置回回国子监, 设监官。以其文字便于关防, 取会数目, 令依旧制笃意领教。泰定二年春闰

① 历代外交机构称谓多有变革, 商称“史”, 周为大、小行人, 秦及汉初为典客, 至汉武帝时改成大鸿胪, 后世多用此称。亦有部分朝代改称或增添附属机构, 如曹魏称典客, 辽金称客省, 元代设侍仪司、会同官、廩给司三部门负责外交, 清代则在鸿胪寺的基础上增设会同馆、理藩院。

② 《后汉书》卷79《儒林列传上》, 中华书局, 1965, 第2546页。

③ 《宋史》卷487《高丽列传》, 中华书局, 1977, 第14037~14039页。

正月,以近岁公卿大夫子弟与夫凡民之子入学者众。其学官及生员五十余人。已给饮膳者二十七人外,助教一人、生员二十四人廩膳,并令给之。学之建置在于国都,凡百司庶府所设译史,皆从本学取以充焉。^①

通过这段记载可以看出,虽仅用于教授阿拉伯语,但其作为国子学的各项规章制度却是相对完备的,有人甚至称之为最早的外交学院。^②首先,其教师选自翰林院出身的亦福的哈鲁丁,授其翰林院学士之职,并在经济待遇上给予其充分的保障;其次,在学生选择上,以“公卿大夫富民子弟”为主,并对部分学生提供必要的生活保障;此外在教学管理上,“皆依汉人入学之制,日肆习之”,即采用全日制脱产学习的学校教育制度;最后,学生毕业之后,择优为官府录用,即“凡百司庶府所设译史,皆从本学取以充焉”。

明朝译语官的学校教育制度进一步完善。永乐五年(1407)于翰林院下设四夷馆^③,规模较大,涉及语言门类也较为齐全。永乐五年初设蒙古、女直、西藩(藏语)、西天(印度语)、回回(波斯语)、百夷(傣语)、高昌(维吾尔语)、缅甸八馆,正德六年(1511)增设八百馆(清迈方言),万历七年(1579),又增设暹罗馆(泰语),^④遂增至十馆。同时,明朝在教育制度上更加完备,对教师的遴选、学生的录取、课程的教授都有了相当细致的规定,采取了相对严格的考核制度。^⑤此时的四夷馆成为东亚语言文字的教育中心,为明中央政府对外交流提供必要的语言支持。

清承明制,据《清史稿》记载:

顺治元年,会同四译馆分设二馆,会同馆隶礼部,以主客司主事满、汉各一人提督之。四译馆隶翰林院,以太常寺汉少卿一人提督之。

① 《元史》卷83《选举志·学校》,中华书局,1976,第2028~2029页。

② 娄延常《我国最早的“外语学院”初探》,《外语界》1982年第1期,第19~20页。

③ 学界亦有人认为明代四夷馆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官办语言学校,盖因前史考证未细之故,抑或以为明代此类学校方形成完善体制。事实上,自有政权即生外交,有外交即需译语,译语岂会生而知之?周之前译语教育体制不完善,散见于甲骨而失于史书;后世儒家鄙薄杂学,故而史书语焉不详,及至明清,年代即近,史料愈详,因而可见其端倪。

④ 《明史》卷74《职官志·太常寺附提督四夷馆》,中华书局,1974,第1796页;胡秋碧:《明清时期的四夷(译)馆》,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硕士学位论文,2008,第13页。

⑤ 廖大珂、孙魏《明代四夷馆初探》,《史林》2016年第4期。

分设回回、缅甸、百夷、西番、高昌、西天、八百、暹罗八馆，以译远方朝贡文字。置班序二十人，朝鲜通事官六人。^①

从这段史料来看，明清针对译语官的语言教育基本上是一脉相承的，但也出现了几处变化。一是改“四夷馆”为“四译馆”，大概是为了避清入关前偏居东北之讳。二是裁撤女直和鞞鞞二馆。此时满语已为官方语言之一，自是不宜再列入外语范畴。满蒙素来亲近，在入关初期二者言语相通者众，故而鞞鞞馆也没有存在的必要。后又根据需要增加了朝鲜、日本、安南、占城等馆，所涉语言多达十余种。三是增设会同馆，隶属礼部，细分教育培训与外交接待的具体职能；后因四译馆衰落，二者又再度合并。

三 译语官职司的多元性

由于教育和信息沟通的局限，在古代东亚通交活动中，只有少数使节通晓出使地语言，而大多数使节只识本地区语言。由此，在中枢机构及边境设置专门用于接待异域来宾的机构或译语官就显得非常必要了。尽管先后有别，但东亚诸政权都曾设过译官。中国这一官职在史籍中最早见于《周礼·秋官·象胥》，它详细记录了这一官职的具体职能、职责及官吏配置情况：

象胥：掌蛮、夷、闽、貉、戎、狄之国使，掌传王之言而谕说焉，以和亲之。若以时入宾，则协其礼，与其辞言传之。凡其出入送逆之礼节、币帛、辞令，而宾相之。凡国之大丧，诏相国客之礼仪，而正其位。凡军旅、会同，受国客币，而宾礼之。凡作事，王之大事诸侯，次事卿，次事大夫，次事上士，下事庶子。凡作事：王之大事，诸侯；次事，卿；次事，大夫；次事，（上）士；下事，庶子。象胥：每翟上士一人，中士二人，下士八人，徒二十人。^②

① 《清史稿》卷114《职官志》，中华书局，1976，第3283~3284页。

② 《十三经注疏》卷38《周礼注疏》，中华书局，1980，第899~900页。

由此可见，象胥就是指“通夷狄之言”、专事翻译四方使者言辞的译语官。从上述文献的记载来看，这一官职的具体职能大概可以分为三个方面。一是“掌蛮、夷、闽、貉、戎、狄之国使”，即负责接待各国朝聘使节，并负责向他们转达周天子的王谕。如果是新登基的国王首次派使者前来朝聘，则要专门安排接待礼仪，并负责将其国书、册表之类的文书及贡品转呈奏报；在天子召见国外使节的过程中，“凡其出入送逆之礼节、币帛、辞令”，这些译语官也要在场，对各种仪式和谕令进行现场翻译。二是在“国之大事”之时，接待前来吊祭的四夷使者，指导他们参加丧葬的礼仪，引导其站到相应的品秩序列中。三是在国王出征、会盟时，负责按规定的礼仪接待沿途前来进献的使者，并在战争和会盟中履行翻译职能，如刺探情报、审问战俘、进行会盟现场的翻译等。当然，象胥还要根据具体事情需要，按照等级秩序协调与外事相关的内政问题，即“凡作事，王之大事诸侯，次事卿，次事大夫，次事上士，下事庶子。”《周礼》对中国古代后世的职官设置影响甚为深远，后世译语官的设置，也大多因循《周礼》。

汉代是中国古代通交管理机构的确立和奠基时期。这一时期，汉王朝架构了一个从中央到地方的相对完备的职官体系，其在中央分别确立了以九卿之一的大鸿胪、诸曹尚书之一的主客曹为涉外主管的机构，^①在这两个机构中都设有译语官之职。《汉书·百官公卿表上》对于汉代译语官的设置及其衙署嬗变做了比较详细的记载：

典客，秦官，掌诸归义蛮夷，有丞。景帝中六年更名大行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鸿胪。属官有行人、译语官、别火三令丞及郡邸长丞。武帝太初元年更名行人为大行令，初置别火。王莽改大鸿胪曰典乐。初，置郡国邸，属少府，中属中尉，后属大鸿胪。……典属国，秦官，掌蛮夷降者。武帝元狩三年昆邪王降，复增属国，置都尉、丞、侯、千人。属官，九译令。成帝河平元年省并大鸿胪。^②

根据这段史料的记载可知，汉代因袭秦制，设立了以大鸿胪和典属国为首的

^① 黎虎《汉唐外交制度史》，兰州大学出版社，1998，第49页。

^② 《汉书》卷19《百官公卿表上》，中华书局，1962，第730、735页。

两个独立的外交机构，大鸿胪下设有属官“译语官令、丞”，而与其关系密切的典属国下亦设有属官九译令，译语官令与九译令均为执掌翻译之官，二者性质相同。后来典属国并入大鸿胪，译语官的职责进一步加强。^①关于汉代译语官的具体人物及其活动，《汉书》也多有记载。如《周堪传》曰：“周堪字少卿，齐人也……堪译语官令，论于石渠，经为最高，后为太子少傅。”^②可见译语官的来源中有像周堪这样博学的儒士。《董贤传》又云：“明年，匈奴单于来朝，宴见，群臣在前。单于怪贤年少，以问译，上令译报曰‘大司马年少，以大贤居位。’单于乃起拜，贺汉得贤臣。”^③此条史料对译语官的具体活动做了记载，即在外国使节入宫觐见的时候，译语官需陪同前往，并进行入场及觐见的礼仪指导和现场翻译。

四 四夷译语的异称

为了维护各自的利益，保持交往的便利，中原王朝周边诸国也渐次设置了自己的译语官。不同于中原译官，在异域中掌握汉语的译语官往往地位较高。在古代中国及域外汉籍中对译语官称谓的记载较为繁杂，同词异义、同义异称者颇多，见诸史料的有：译使、使译、导译（译导）、贡译、翻译、通译、通事（通事官）、译长、译士、译人、译者、新罗译语、奈罗译语等近二十种之多。单就这些称谓本身分析，可以分为身份称谓和职司称谓两种。身份称谓即以译语官的族属来源以及具体社会身份代称其人，如新罗译语、奈罗译语等，其余多为职司称谓。

译使、使译、导译（译导）、贡译、通译、通事（通事官）、译长、译士、皆是诸夷对译语官的不同称谓。关于遣“译使”入中原的记载最早见于《三国志·田畴传》：“北边翕然服其威信，乌丸、鲜卑并各遣译使致贡遗，畴悉抚纳，令不为寇。”^④这段记载说明了派遣译使的前提和目的，即少数民族以及藩属国因“服其威信”，而主动派遣外交使节来朝贡，进而通过这种外交手段来维护自身安全，同时获得政治、经济、文化利益；中原政

① 黎虎《汉唐外交制度史》，第49页。

② 《汉书》卷88《儒林传·周堪》，第3604页。

③ 《汉书》卷93《佞幸传·董贤》，第3737页。

④ 《三国志》卷11《魏书》，中华书局，1959，第341页。

权则通过这种“抚纳”的外交手段来实现边界安宁,即所谓“令不为寇”是也。

使译,略与译使同,其称见于《后汉书》和《三国志》。《后汉书·和帝纪》载:“(永元)六年春正月,永昌徼外夷遣使译献犀牛、大象。”^①这里的“使译”显然指的是来自东南亚一带的“外夷”的译使。《东夷传》云:“倭人在带方东南大海之中,依山岛为国邑。旧百余国,汉时有朝见者,今使译所通三十国。”这里的“使译”指的是来自日本的译使;同传又云:“魏世匈奴遂衰,更有乌丸、鲜卑,爰及东夷,使译时通,记述随事,岂常也哉。”^②这里的使译则是指来自我国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乌丸、鲜卑以及朝鲜半岛等东夷诸族的译使。由这几则史料可知,在后世的解读中,“译”字已经突破了其“北方曰译”的狭义概念,泛指对外交涉中的从事翻译之职的人员,这一称谓的内涵,既包括中国精通少数民族和外国语言的外交使节,也包括外国精通中国语言的外交使节。

此类官员的设置在东亚诸国之中当为不少。他们的主要职责当是起草奏章、诏书、表文等各种文书,并负责官方文书的翻译。贾岛《送于中丞使回纥册立》诗曰:“渐通青塚乡山尽,欲达皇情译语初。”^③其中转达皇帝抚慰藩国回纥的“译语”,以及中丞使所携带的册立回纥国王的诏书当是此类专职从事诏书翻译的笔译语官所翻译的。《三国史记》中记载了弓裔的摩震政权设有“史台”,著者自注曰“掌习清译语”,其中译语应当包括官方文书。而日本旅唐僧人圆仁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载,会昌二年(842),日本遣唐使“取本国书信”,所得到的“大国书二封”,也是日本的译语官按日本天皇的意思所写的。

译长是西域诸国对于译语官的称谓。该称谓初见于《汉书·西域传》,其文曰:“鄯善国,本名楼兰,王治扞泥城,去阳关千六百里,去长安六千一百里。户千五百七十,口万四千一百,胜兵二千九百十二人。辅国侯、却胡侯、鄯善都尉、击车师都尉、左右且渠、击车师君各一人,译长二人。”^④从这段史料的记载来看,在鄯善国的官职设置中有专职的外交官员,官称为

① 《后汉书》卷4《和帝纪》,第177页。

② 《三国志》卷30《魏书》,第858页。

③ 《全唐诗》,岳麓书社,1998,第508页。

④ 《汉书》卷96《西域传·鄯善国》,第3875页。

译长。事实上，汉代西域部族政权很多部族都设有译长，且根据自身国力大小，译长数目亦多有差别，大国三四人，小国一二人。《汉书·西域传上》记有诸国译长：龟兹国译长四人，鄯善国、姑墨国、温宿国、尉犁国以及车师前国分别有译长二人，乌垒等小国仅有一名译长。^①

关于这些译长的身份，据《汉书·西域传下》载“凡国五十，自译长、城长、君、监、吏、大禄、百长、千长、都尉、且渠、当户、将、相至侯、王，皆佩汉印绶，凡三百七十六人。”^②由此可见，西域各部译长，与其他西域官吏类似，皆由中央王朝任命，并颁发印绶，以示身份之合法。另据《汉书·西域传序》载“武帝时，西域内属，有三十六国。汉为置使者、校尉领护之。”^③可见译长之职大概是在汉武帝之后方有，在具体职司上则主要与汉使联络沟通。译长一称唐朝仍有沿用，《新唐书·裴矩传》载“译长纵蛮夷与民贸易，在所令邀饮食，相娱乐。”^④可见，此时译长仍是边境贸易的活跃人物。综上可知，译长是古代藩国之中主持传译与奉使的译语官，至少在汉代，这类官员是受中原王朝册封的，后世是只沿袭其称谓；培训考核之后，令其赴蕃任职，尚需进一步考证。

在东亚文化圈中与中国往来比较密切的朝鲜半岛和日本也都有类似于“译长”的官员，史料一般称之为通事。如日本之太宰府内设有专门从事语言翻译的通事，而新罗则曾设过详文师、通文博士和翰林等从事语言翻译的官员。此类官员汉语水平较高，有些具有较好的文学修养，甚至可以和往来的使者吟诗交流，其主要职责是起草奏章、诏书、表文等各种文书。如新罗崔致远就曾担任此类官职，并先后代新罗宪康王、定康王、真圣王及孝恭王撰写了《新罗贺正表》《嗣位表》《起居表》《谢嗣位表》《谢恩表》《谢不许北国居上表》《谢赐诏书两函表》《遣宿卫学生首领等人入朝状》《奏请宿卫学生还蕃状》《新罗王与唐江西高大夫湘状》等外交文书。^⑤而日本旅唐学问僧圆仁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所载的日本第十八次遣唐使所携带的“大国书二封”，也有可能是日本太宰府通事按日本天皇的意思所

① 《汉书》卷96《西域传》，第3875~3921页。

② 《汉书》卷96《西域传》，第3928页。

③ 《汉书》卷88《西域传》，第2909页。

④ 《新唐书》卷100《裴矩传》，中华书局，1975，第3929页。

⑤ 党银屏《唐与新罗文化关系研究》，中华书局，2007，第135页。

写的。

通过以上文献考辨,不难看出从事语言翻译的译语人是东亚通交中不可或缺的媒介,与各类跨区域交往活动相伴始终,其在东亚诸史籍文献中以繁多异称的形式呈现。究其原因,有四个方面:一是自春秋战国以至秦,先是礼崩乐坏,后有焚书坑儒,以致周失其礼,“像胥”之称不复使用,后世典籍在记录译语人时,各按其专,再无统一标准;二是自董仲舒杂糅百家创“春秋一统”之新儒学,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经义以外皆为下品,中原文化以外皆为蛮夷,不得入流,自此译语人多以“蛮夷”充任,作用虽大,但职位不高,这就造成译语人来源纷杂,社会层次参差不齐,称谓自然也就更加随意;三是官史壅蔽,只重帝王将相,许多在东亚通交中起过重要作用的译语人多被隐藏于历史事件的背后,只以方言俚语代称实际人物,方言俚语每域不同,各类称谓亦随之繁杂;四是译语人本身身份的多重性,使得其具体称谓亦多有不同。

五 余论:东亚译语人的存在及价值

通过对东亚译语人相关问题的梳理可以看出,译语人长期、广泛地活跃于东亚各个区域之中,是东亚交流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群体,在不同时期、不同社会层面均显示出重要价值。

首先,活跃在东亚地区的译语人伴随东亚区域交流之始终,且随着交流区域的不断拓展,规模不断壮大,主体不断变化。通过对译语人的教育及养成过程的梳理,我们不难看出,译语教育起于周制,历代皆有,不曾断绝。及至元明清之时,译语教育制度更加成熟,教师的遴选、学生的选拔、学成之人的任用皆有规章。而随着中国疆域的拓展,译语人的来源也由早期的“寄”“象”“狄鞮”“译”所指代的黄河流域周边的蛮夷部族,逐渐扩展为朝鲜半岛、日本等海外地区。这些变化说明了东亚汉文化圈的不断拓展和东亚区域融合不断向纵深方向发展。

其次,有关译语人的记录散见于诸多史籍,异称繁多,这恰恰说明译语人是东亚地区最活跃、流动性最大一个群体,是东亚长期共存的见证者、多元共融的推动者。尽管主体有所变化,但在东亚区域中始终有译语人身影的存在,这就说明东亚地区始终处于多民族共存的多元状态。译语

人主体的变化也在一定程度上见证了东亚区域内民族活动主体的兴衰。与此同时，译语人也是沟通各个族群不可或缺的行动主体，对各民族间增进互信，各政权间化解矛盾，建立友好和谐的区域关系，实现区域共融共存起到了重要作用。他们也为相对封闭的东亚各区域带去了彼此的发展信息，推动了先进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的传播，推动了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多元文化的区域间传播。

最后，活跃于大漠边疆和风涛沿海的译语人，以其不畏山高路险，乘风破浪、勇敢前行的冒险精神和开拓意识，给东亚的交流与交融提供了沟通的前提。他们体现了东亚人民在面对生活和磨难时的无畏态度。在具体的职司中，他们上助使者达于远邦，下怜平民捎信问安，行进中徙贵就贱，贸易营利，为以农耕为主体的东亚各地区民众带去所需的商品的同时，也增进了彼此之间的了解与互信。

A Study of Translators in East Asia Regional Exchanges

Chen Jianhong , Miao Wei

Abstract Translators are indispensable intermediaries in East Asian traffic. Due to the limitation of official history books in the Chinese cultural circle , the historical events of the translators are scattered in the historical books sporadically , with complicated appellations and multiple responsibilities. They come from different tribes , and their functions involve translators , messengers , guides and many other roles. The education and cultivation of the translators needed by the Central Plains Dynasty for itself and the surrounding regimes run through the whole process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d are constantly improving. This group is active in every link of East Asian traffic and runs through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East Asia. It not only builds a bridge for regional exchanges in East Asia , but also promotes the understanding and integration of East Asia. It is an important element of regional integration in ancient East Asia.

Keywords Translator; Siyi; East Asia